

读者十论：社会达尔文

“读者十论”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组精彩读者留言刊出。



這有一點社會達爾文的味道，你是更認同為了佔人口總數63%的年輕人的自由，而讓19%的老年人參加這種高傳染性中低致死率病毒的暴露實驗，還是更認同為了弱勢的少部分人，限制所有人的自由。

讀者 **drt** 回應《大陸堅持執行「清零」，市民要求改變防疫政策呼聲卻越來越大，你如何看？》



端传媒社群组 | 2022-03-27

读者十论

【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drt、FavaBean，回应圆桌话题《大陆坚持执行“清零”，市民要求改变防疫政策呼声却越来越大，你怎么看？》

drt：接种了疫苗也会感染，不管是数据上不是很靠谱的国产疫苗，还是“靠谱”的海外疫苗。全民接种≠全民不会感染。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朋友接种了N剂也还是感染了omicron。要是全面放开的话必定会有更多的死亡，年轻人可能大多没有问题，而中国很多老年人身体状况比起别国可能并算不上特别健康。这有一点社会达尔文的味道，你是更认同为了占人口总数63%的年轻人的自由，而让19%的老年人参加这种高传染性中低致死率病毒的暴露实验，还是更认同为了弱勢的少部分人限制所有人的自由。

我自己是更认同后者，不光是因为自家也有老人，也是觉得因为自己的可以取舍的利益把别人置于高风险是不合适的。不过这也不代表当前政府一刀切的暴政是恰当的。我觉得可以实施更为精确的接触追踪（像韩国及欧洲的应用程序追踪那样）和更为温和的隔离政策（而中国政府监控人民的能力无出其右）。台湾就在没有封锁的情况下控制得很好。不过层级结构及无限责任制的中国官僚体系，和防疫政治化都让这样的措施不可能被实施。

FavaBean：@drt：同时得考虑到生死病死是人生的一部份 老龄是死亡的最大风险因素 一个健康的老人家也会轻易因肺炎或尿道炎过世，只看新冠死亡率没有意义，因为它可能会令本来会因尿道炎而死的人死，但归根究底死因是死于高龄。一个国家可以考虑追求不增加excess death也可以只追求mortality displacement (ie放手让本来就会死的人早几个月或一年死) 这算上社会达文而是生命历程的一部份 如果不想要excess death, 新加坡，纽澳都做得不错。

2. EricChan，回应《大陆Omicron疫情失控，中国式“共存”是否可能？》

我在网上看到的另外一种解读是在这一波Omicron疫情各地的应对策略中出现了央地政府对抗的状况。中央政府希望维持过去抗议成功的政治正确。地方政府则受限于本地税收和卖地收入减少，地方经济经不起封城的折腾（典型的例子就是郑州在去年洪水和疫情的双重冲击下元气大伤）。而且部分省市，诸如东莞和吉林能动员的人力或者财政资源有限（东莞政府出了名的抠，吉林人口大量流出，缺人又缺钱），一旦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封城指不定会出什么乱子。封城这种重大行动不仅耗费甚高，而且体制内的官员还会管控居民行动时面临一场又一场关公灾难的挑战，分分钟乌纱帽不保。地方官员再搞大型封城的积极性也会降低，更希望采取共存的方法。

即使是上海深圳这种过去以流调精细著称的大城市，也在这次封城里出了不少冲突，例如上海某癌症患者因所在小区列为封控小区，隔壁以治疗癌症著称的三甲大医院也不接收来自该小区的病人，因而无法接受

化疗，病人最终去世（未知是否与未能接受化疗相关）。网络上对于封城的不满和牢骚也肉眼可见增多：例如吉林的学生不满校方在安排核酸检测时因为系统故障排队排到凌晨两点，某封控小区居民在凌晨四点被大喇叭叫起来做核酸；各个封控小区学校组织的爱国爱党宣传活动，例如小区各住户在家里合唱爱国歌曲的通知文件都不断被摆上网。大家对于防疫政策是出现疲劳的。

3.Sleiya，回应《大陆Omicron疫情失控，中国式“共存”是否可能？》

不是很明白作者认为内地人民对病毒感到“恐慌”的说法来自哪。普遍民众，即便是疫区的人，也只是单纯为封控带来的不便感到担忧。当然，直接受影响的人，例如吉林农大的学生们，是感到恐慌的。但，例如村民，或绝大多数没有受多大影响的普罗大众，根本没有恐慌情绪。当然，恐慌作为一个感情形容词，每个人的定义程度都可能不一样。但我认为“警惕”、“敏感”、“防范”更能代替“恐慌”。

甚至，时至今日，在疫情未发生、轻微发生的地区，能常见到9成人不戴口罩的情况。我认为作者应更深刻了解内地人民对疫情的反应，而不是放大局部人的恐惧，以偏概全。作者对内城实施“动态清零”持续有效性的质疑和论述，算是严谨，可持续观望以判断之。我的观点，并非是说内地民众都不怕疫情，也不是说绝对不存在一丁点的恐慌，只是我认为恐慌的绝不是大多数人，也绝未成为社会现象。要找到内地市民对疫情感到的恐慌，只能从局部看。再重申一次，我不否定文章的全部内容，只是对“恐慌”呢part甚是质疑。

4.EricChan，回应《青春养成记：华人妈妈最难顶？为何社会总要求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

与其话社会要求男人情绪稳定，倒不如话男权社会给予了女人情绪不稳定的特权/性别定型吧。社会上对于女性天生就是特别情绪化，刁蛮妻子，吃醋等对于女性表面上包容宠溺，实则矮化女性的表述可不少。

而且这篇文章对于华人妈妈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那样在性别上有所区分？文中提到的华人母亲对于女儿的对待方式，特别是服从母命与随心所欲这一部分，与华人男性的成长是否就有所不同？难道男孩就不需要与他们的华人母亲在同样的矛盾中挣扎？

再讲句政治不正确的说话，就字面上看，我觉得Connell说的话其实不无道理。这套影片中表达的，以母亲为代表的华人女性对子女的期望其实“既不传统，更不男权”。回到100多年前的儒家中国乃至亚洲（即使到现在也还是），女子拥有知识，有自己的成就和事业其实是一大禁忌。直到一系列文化上西化运动以及东亚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女性才被期望能外出工作支持家庭（甚至是家中的兄弟）。所以当我看到这篇立章的作者诉求同龄人女性在这套影片的共鸣的时候，我是有点错愕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这套影片在

个时期的社会性别平等观念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确实是值得探讨的。但在世界范围内，社会性别平等谈及的一些父母期望与子女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对于当时全世界的华裔女性乃至亚裔女性来讲都是蛮奢侈的，更不要说宗教色彩浓郁的南亚与西亚国家。只有像是“多伦多亚裔”这种生活在大城市中产家庭，信奉菁英主义的亚裔才有时间精力去“成为一个虎妈”。在作者的同龄亚裔女性的成长经历中，很多的成长是伴随著父母重男轻女观念下的忽视，又或者是家庭忙于生计的无暇照料中。

再具体的例子，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 》算不算是一套强调女力的电影？她似乎是作者对这部电影理解的反面。电影中阿米尔汗饰演的爸爸对两个女儿强加自己的期望（成为摔跤运动员），抹去两个女儿的女性化特征（像男孩一样剪短发），放弃同龄人的娱乐，最后成为成功的女摔角选手，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不是像村里的其他女孩一样年纪轻轻就嫁给陌生男人，而是有自己可以依靠的事业。这套故事情节又是不是在强调《女力》，还是强调女性只能“男性的方式”去获得成功/地位？究竟作者所谓的与生俱来的女力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他是一份传承的礼物去让女性发展自我？还是将女性囚禁于某种以“天职”“天性擅长”为命的刻板印象囚笼里？（这些问题我也没有想到一个答案）

5. 解开维多利亚的秘密，回应《《不平等的样貌》：一本探讨新加坡贫穷的民族志，如何戳破国族论述的假象》

文章很有启发性，特别是新自由主义那部分，政府处处介入，为何还是新自由主义。文章里介绍的新加坡中产阶级和低收入户的对比，让我觉得似曾相识，和很多科幻电影里对未来世界的描述都有类似之处。人的工具化，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工具，那么你就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奖励。

很多中产阶级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应得的，对于结构性的不公平并无太多认知，大陆互联网上类似的现象也很常见。我感觉新加坡似乎是把这样的价值观作为了一种指导思想，对于发展经济也许有效，但是离一个理想社会实在是相去甚远。

6. EricChan、everydaydreamer，回应《【不断更新】东航MU5735舱音记录器已找到，搜救区域已超坠机核心区10倍》

everydaydreamer：大型事故也是观察中国的窗口。从微信和微博来看，现在国内已经形成一种氛围，发生事故，大家都说不要乱猜测原因——包括不少媒体人，不要传谣言，事故原因还没有清楚，大家现在应该要为遇难者默哀。不得不说，官方真的很省心。但不明白的是，现在垄断消息的都是官媒，记者不去找各方猜测（其实就是推测啊，为什么不能推测事故原因？），那最后就是等官方公布“事故真相”了吧？

这种氛围，和他们说香港记者不能就大陆医护的医疗事故追责提问，是一样的。仿佛不提问，问题就不在了。

EricChan : @everydaydreamer : 因为在没有黑盒子的情况下就做出事故原因的推测非常不负责任。几年前的复兴空难，很多台湾媒体普遍认为事故原因，主要是因为复兴航空财政紧张导致飞机保养不当，才会出现在航空界极度罕见的双发失效。并且大多称赞机师在松山机场起飞后竭尽全力避开人口稠密的市区坠毁在淡水河口。但随著调查深入才发现空难的主因在于机师本人的操作失误，关闭了正常运作的引擎导致飞机失去动力，背后这是复兴航空在市场激烈竞争下提供优厚无法留住人才，令它们被迫雇用涉事机师这种水平不佳的机师。在正式开始调查前与调查后展示的是不同的故事。

还有737Max 的两起空难，最开始传媒都会将焦点放在印尼狮航的经营状况与印尼民航糟糕的飞安历史，但整起空难的主因MCAS系统更是到了另一家以专业可靠著称的埃航同款机型出现空难后才渐渐成为舆论焦点。空难本身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调查的过程，资料与证据的搜集往往需时甚长，过早的舆论介入会导致公众压力影响调查方向与进度。空难的调查不同于一般罪案的调查，其首要任务是彻底厘清空难的成因，以及如何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发生，而事故的责任划分就不在其重点当中。而调查的公正性更多时候是依赖航空业界的跨国合作，依照惯例邀请外国专家加入调查以确保公正性。在过去的案例中，也会出现调查组不同专家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各自推出各自报告的案例存在。

当然，这不代表媒体不能根据已知的事实对空难原因作出可能的猜想，但是很难做到事故可能原因的推测或推论。可以报导涉及航空公司过去涉及的争议，但不太适宜将这些争议与事故的原因拉上明确的关系。

everydaydreamer : @EricChan : 嗯嗯 我想你提及的事件和中国目前的环境，都蛮有距离。这次能够进入事故现场的，应该只有三家官媒，所谓的调查，完全垄断在官方的手中，而同时间，官方默许甚至跳动民间对媒体报导的质疑，一方面是说媒体乱猜测、传谣，另一方面就是演化到昨日的——《人物》采访到遇难者家属并做特写，被认为是“吃人血馒头”，没有新闻伦理，完全无视受害者家属发声受访的权利，此后这篇文章被禁止分享。我是基于这个背景去谈。当然，在一个信息环境开放、自由的社会，对于空难，其实是对于任何灾难原因的报导都要谨慎、专业。

7. HermetianKeno，回应《由防疫抗疫基金说起：港府公帑用了在哪里？》

这部电影不适宜作为对北欧五国，尤其是欧陆上的四国其女性于三十岁焦虑的一个认知切口，它首先是提尔和编剧Eskil Vogt两人对在奥斯陆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容易陷入失望的人的构想与处理，电影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但其实并没有怎么触及与Julie身份类似的三十岁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女性们的基本困境，我想这些困境本就是主创无意呈现的。

北欧（不完全包括冰岛，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都是独立于欧陆四国尤其是卡尔马三国的）的开明进步富足有一块十诫作为基石：Janteloven（詹代法则）。尽管这只是一个源自讽刺小说的概括，但它确实很鲜明

地指出了北欧集体主义意志下，日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社会对人的持续规训与抑制。

最近因NYT的报道而名声更盛的Cissi Wallin案件只是瑞典乃至整个北欧社会持续的谦逊沉默文化的又一次体现。在北欧，捍卫犯罪者的隐私权与惩罚揭露公众人物罪行的人，这两种行为并行不悖。沉默是一项美德，如果一个人有任何问题，可以去警局，可以去法庭，让一切沉默地受著所谓国家道德意志与公正司法的注目。在上帝、国家、律法、社区、亲友面前，所有人都是谦卑的。这或许也是Julie-主创们在设计求助前男友的情节时，所不必过多思考的一种常见于社会氛围里的自然。

北欧确实在性别平等议题上达到了一个高度，但这个高度只是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它们在工作性别比上做得不错，很早就通过了有助于职业人士抚养儿童的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半岛的中产阶级女性能够普遍做到哪怕是Julie这样的失望。甚至，Julie呈现出的困境与激切的地方，三部曲那些发生在奥斯陆的“失去”与“等待”，都是Janteloven那种欲使所有人冷静且安顺的风格，同它并不可能压抑的变迁的流动的现实，与现实内含的各类欲望、矛盾、冲突的持续交互的结果。他们要生活下去，要戴好口罩，要取下口罩，我们也是，这些是属于历史，属于思考，属于忧郁，属于消失，但首先属于我们自己的种种现实。

我还想再补充些我的看法：北欧距离自由幸福公正天堂的距离并不比西欧更近许多，美国在某些方面也并不比北欧糟太多，但不知缘何，人们很爱慷慨地给予两个半岛以一些过于慷慨的幻象，哪怕这些内容并没有反应在北欧社会的现实里。在工会运动消退以后，欧陆四国出现了明显的以任何一种标准来看都足以称作“民主进程倒退”的情形。私人企业大幅扩张，所谓的高福利社会下，为数不少的企业通过。奥斯陆的条形码城建以及市民对此的所谓“接纳”，这一电影内外俱在的故事本身就是对惯常的北欧迷思的一种打破，对Janteloven的又一引证，而距离这个名词的提出已经过去近九十年了。

提出这些内容并不是为了全然否定北欧四国（冰岛与这四国在各种意义上都极不相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公平的实绩，这些内容在与它们的欧洲邻国以及中美这些国度在同一个百年中的现实相比时总是回精彩一些。但是whataboutism总是不可取的，而在观察北欧的现实时，也不宜有太多的烂漫的绮丽想象，仿若那片有青草与枯叶的世界只有深蓝与洁白。人们有真实的困境，奥斯陆和赫尔辛基的故事不同，勒姆岛的住民也不必体会反对延长无薪假期的市民困顿。一个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它所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只是这种真实的一点投影，它甚至都不是在这一部电影里唯一展示出来的部分。当然，这不是肯·洛奇的电影，但从伯格曼，从更古老的时期开始，在所有的北欧电影之中，我们所看到的焦虑，绝不只是基于对现代社会的空泛飘然的身份反思。集体的男性气质，父亲，婚育，城市改造，顺从，反对张扬个性，代际冲突……它们都是实在的，而且它们从德莱叶至今，并没有产生许多变化，而且它们不仅仅是“普世的”，在普遍存在于被总结概括的社会与生理意义的人性以前，它们首先被生活在其中的人所体验。

腐败的“共识式”权利交换，工会的衰败，对非单一民族构建的制度性排斥，企业绞尽脑汁的盘剥，固化的社会阶层，保守主义的极端化，性别歧视，性骚扰，沉默，沉默，平静，然后是不能以平静自得的更大的顺从……这些内容在北欧这一制度并不全然共同在文化上也不算团结的社会却是一致到惊人。甚至连在大

部分内容上都无法归入“Nordic model”的冰岛也与之共享不少。自然，电影本身没有或许也无意讨论这些问题，一如电影并未探讨一些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命题一样，电影只是描述了主创所觉察到的奥斯陆社会的变迁风景，在这个风景中，有故事永远的主角Anders，有奥斯陆的市民，有奥斯陆的建筑，有路过或生活在奥斯陆的一切，当然也有Julie，一个足够饱满和动人的角色。可是，这些角色不是抽象的，角色们并不只是在思考哲学问题，城市也不只是被人所喜爱，这种喜爱里充满各种忧郁，有个人的伤逝，更有社会巨大顽疾带给所有人与所有风景的并不暗藏只是易被忽略的，貌似轻旋无聊的感伤。而对造成这一在此易被非北欧人称作“感伤”的创痛的根源，我们有时会称其为“压迫”。

8. FavaBean、rsk，回应《香港院舍悲剧：守不住的生命，爆疫两年错失哪些救命时间点？》

FavaBean：这段时间院舍职员辛苦了，他们值得社会更多掌声，政府也应该多批奖金给他们做实事，而不是把钱拿来做人面子工程。然而我不认同张超雄这段：张超雄每天收看新闻直播：死者本身住在院舍，有长期病患，年龄80岁、90岁、100岁……”（社会）不但接受，甚至觉得okay。这么大比例的院舍老人过身，应该引起相当大的公众反应，但现在没有。

这么大比例的院舍老人过身，的确是okay的，一个八十九一百岁的老人，就算没有病也会死，不管是心脏病发、covid还是尿道炎，归根究底都是死于高龄。这是生命历程，如果社会反应大，只能说明社会对生老病死有不合理的期望。比起老人死亡率，我认为社会更应思考自己有没有余力去让他们走得更安详一点，例如开放家人在他们弥留时探病，或者以高薪招募人来当临时护理工，让他们不至于走得那么没人理。重点是生活品质，而不是生存率。

rsk：@FavaBean：或者正如像你讲，因八九十岁因covid19死，未必真的那么大问题。但现在问题是无法见最后一面，对生者或将死之人，都是一生怀憾。

不过，香港的生死教育系麻麻地，就睇器官捐赠率偏低，就知何事。还说中国保存全尸文化之类的理由，都火葬还说全尸……唉。

9. Hsiachin，回应《“拥有开放的红利，承担开放的风险”：深圳，中国防疫的流动性控制实验》

因为封控、封锁带来的行政区划疆界隔离，导致有家不能归，看得见却去不了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即便没有封控，却有可能因应部分地区出现确诊而出现加码检查，而原本被设计的便捷通道也一律封锁。虽然简单粗暴，却极为实用。

那些在市与市之间通勤的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行政部门的藩篱，跨市的协调也显得不便。很多时候，他们只能选择被迫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门槛，他们已经选择在新的地方落脚，却因为手头拮据而选择了跨市通勤，但这两年来变化，更突显了行政界线衔接区域的脆弱

10. raeye，回应《“大翻译运动”能否对抗大外宣：持不同政见者的一场去中心化网络行动》

扯个题外话吧。CLTV上的神友群体其实非常有趣。Ta们虽然脱胎于百度贴吧，但在许多精神内涵上与广义上的抽象系贴吧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很多时候我们常把神吧、那吧对立，或者将其与v吧、抖音系（比如万合系）归于受抽象文化影响或部分影响的泛抽象文化圈。但红迪神友其实与其国内的前身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

我个人认为很关键的一点是“墙外”这一关键变量的引入：无论如何，会翻墙的红迪神友放在国内网络环境都算得上是“蝙蝠人（泛指与“鼠人”对立的社会强势群体）”了。我一直都觉得他们其实很像俄罗斯文学中的“边缘人”群体，而神吧时期的神友或是抽象系则更符合尼采笔下的“末人”，尤其是失去一切超越向度的面向。

按维基百科的说法，多余人通常指的是一批受过西化教育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他们有改变俄国的理想，对农奴制和宗法制不满，但缺少改变社会的行动，而是专注于决斗、赌博、享受，无所作为地活着。

（Wikipedia）而英文维基上说的更直白：It refers to an individual, perhaps talented and capable, who does not fit into social norms. In most cases, this person is born into wealth and privilege.（它指的是一个人，也许有才华和能力，但不符合社会规范。）

很多红迪上的“浪人”所属的大学生群体，本身就有“边缘人”的情况：ta们一方面属于成年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是未来或是现在进行中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则处处受到大学辅导员、思政教育的拿捏。社会化过程中“个人理想”与“社会规训”的冲突在他们身上以一种恶性的、随着近年政治恶化逐渐强化的形式展现出来，造就了他们犬儒且虚无的精神面貌。

而这样一个群体所发起的“大翻译运动”则很符合上述逻辑：ta们不寻求国内现状的改变，不满于国内现状的恶化，不屑于把自身塑造为新时代青年；ta们经常会不经意地试图操纵、贬低或安抚社会中的个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舒适和安全；ta们唾弃政治伟人，否认神圣价值，但并非不承认超越向度的存在。这样一个群体想要向“自由世界”呈现的中国形象也正是ta们自己无家可归的身份认同。因此讨论“这会煽动仇恨与偏见，并损害海外华裔”本身就是鸡同鸭讲的一件事。神友既不认为仇恨与偏见会因“大翻译运动”而起，也不认为这两者会随大外宣而终；既不认为“中国人”是ta们的身份，也不认为“华人”是一个切实存在的整体——他们只是想做些什么，无论什么。

另：前几天我还和几个朋友谈到我们可以把CLTV的帖子和贴吧时期的帖子爬下来当语料集，然后跑个DID之类的。但我们感觉这个自然实验确实不太好写，再说了这一阵子DID的文章比较泛滥，做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前几年AER上那篇关于vpn的还有那篇关于中文维基的文章，数据做出来确实非常漂亮。但相似的自然实验还是不好找啊.....